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第 30 期 2009 年 9 月 頁 117-164

SOCIETAS: A Journal for Philosophical Study of Public Affairs

No. 30, September 2009, pp. 117-164

# 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考察： 以鑲嵌的問題史為主軸\*（下）

湯志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The Problematics of Embeddedness (II)

by

Chih-Chieh T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ctang@gate.sinica.edu.tw

---

\* 感謝柯志明、鄭陸霖、魯貴顯、林文凱、蔡博方、李令儀對本文初稿的針砭，兩位匿名評審與編委會的指正，以及洪婉茹、陳柏廷、吳宗霖在寫作上的協助。

收稿日期：2008 年 10 月 17 日；通過日期：2009 年 4 月 14 日

## 摘 要

本文嘗試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對新經濟社會學做一歷史的考察，指出它如何藉不斷改寫自身歷史此一劃界的動作，逐步鞏固為一個分支領域，並相應地從多元的聲音變成單一的主旋律，聚焦於鑲嵌的問題，從而在理論上遭遇到瓶頸。藉著與系統理論對話，本文指出應關注的並非鑲嵌程度的問題，而是不同社會分化形式下各有何不同的鑲嵌形式的問題。同時，要能正確地邁出這一步，要求有個後存有論的觀念轉換，從徹底時間化了的元素的觀點重新思考結構／施為這個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此外，唯有當社會學一一重新概念化如價格、市場、貨幣、資本、勞動等核心的經濟概念，才有可能在此基礎上建構一套真正的社會學經濟理論，與經濟學理論相匹敵。

關鍵詞：經濟社會學、系統理論、鑲嵌、分化、結構耦合、結構／施為、後存有論

## 七、如何重新概念化鑲嵌：幾個可能的方向

### （一）Block：市場性的概念

秉持這樣的看法，鑲嵌這個詞彙或許可以拋棄，但就它作為概念來說，其背後所隱涵的觀念與理論邏輯仍然值得我們探究與釐清。對此，我們可以先用個例子來說明。例如，被推許為以理論綜合見長的 DiMaggio 如此轉述 Granovetter 關於鑲嵌的看法，而不覺得有何不妥：非市場社會中的經濟行動比 Polanyi 所暗示的更為來得具計算性與策略性，市場社會中的經濟行動則鑲嵌的比 Polanyi 所暗示的要來得深 (Zukin and DiMaggio, 1990: 15)。雖然，「市場社會」不但是 Polanyi (1957a[1944]) 自己選用的詞彙，更是他建構出來的理想型，因此 Granovetter (1985) 和 DiMaggio 「前市場社會」、「非市場社會」的修辭看來只是追隨 Polanyi 的用法而已。然而，真要根據 Polanyi (1957b) 的看法，互惠、重分配與（市場）交換三種原則或制度模式並非指演化上的不同階段，而是或多或少同時並存於所有社會之中的元素 (Barber, 1993[1977]; 1995; Krippner, 2001: 779)。所以，像「前市場社會」、「非市場社會」這樣的命名與措詞其實極易造成誤導，讓人誤以為前現代的社會中「沒有市場」，正落入 Polanyi 晚年致力糾正的「唯經濟論的謬誤」，錯誤地以現代的觀念來理解過去。<sup>1</sup>

為了校正把所有實際的市場都等同於——經濟學迄今仍一直奉為理想的——「自律市場」的錯誤觀念，身為 Polanyi 的學生、較傾向

---

<sup>1</sup> 這同樣反映在 Zukin and DiMaggio (1990b: 15) 把計算及策略與社會關係或所謂的鑲嵌對舉，視為互斥的實體性關係，而非認為不同的時代中、不同的社會結構下，兩者間會有不同，且各自相匹配的組合。

左翼立場的 Block 主張，應把作為價格形成機制的市場視為變量，提出所謂「市場性」的看法，指出經濟交易的市場性實際上是個可變動的連續光譜，其市場性的多寡是根據價格與非價格因素的相對比例來決定（Block 著，鄭陸霖、吳泉源校譯，2004，第3章）。在對抗經濟學的觀點上，這不失為一個有力的洞見。然而，就像 Granovetter（1985; 1990）主要把鑲嵌理解為「程度」的問題一樣，這種從「程度」、「量」來掌握市場或鑲嵌的方式，忽略了在不同類型的社會中、不同的社會結構下，各有著與之配套的不同鑲嵌（或市場）模式這個更為根本的類型學——而這無非正是鑲嵌的「理論」，同時也遮掩了從傳統到現代社會一個質上的跳躍和斷裂。如 Uzzi（1996; 1997）的研究所顯示的，唯有就質上相同的、同一個類型範疇內的不同個案來比較其鑲嵌程度的差異才有意義。比較經濟行為在前現代社會與現代社會中鑲嵌「程度」（而非類型）的異同，只會造成誤導，徒然浪費精力，而沒有太多理論上的意義。<sup>2</sup>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雖然 Granovetter（1990; 2002）在提出未來理論研究的議程時，區分了三個層次，並且引進制度的社會建構的想法，甚至開始嘗試與結構／施為這個社會學理論的核心問題關連起來，乃至嘗試引入時間，在理論上有了許多進展，但不足以克服前述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根本尚未進入到他的認識之中。

---

<sup>2</sup> Luhmann（1981: 245）曾提及類似的觀點，他說追問現代法律的發展是增長或抑止人們進行訴訟的意願，亦即是否讓對法律議題的論題化變得更為容易，不太有意義。另外 Luhmann（1982: 233）也說，「分化的程度（及因此：複雜性的程度）是由分化的形式所製造及媒介的」。

## （二）Beckert：鑲嵌、去鑲嵌、重新鑲嵌的動態

新經濟社會學之所以會在理論上遭遇瓶頸，相當程度跟研究者多只把目光放在現代社會，缺乏長期歷史演變的視野有關。對比來看，古典社會學的特徵卻正是透過歷史比較來掌握、釐清現代社會——儘管如 Abrams（1972）批評的，這些宗師們實際上採取的立場往往是「非歷史的歷史主義」。因此，在認知到「所有的經濟都是鑲嵌的」同時，我們還必須去探究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中是「如何鑲嵌」的差異。就像 Beckert（2007）在檢討新經濟社會學如何改變了 Polanyi 鑲嵌概念的意涵時指出的，新經濟社會學所選擇的出發點，在發展宏觀的經濟理論上有所限制，因為它無法區辨傳統與現代的差異何在，反而是強調傳統與現代經濟結構上的類似性。雖然，像前面也提到的，在當時與現代化理論抗衡的背景下，這種強調連續性的主張有其說服力，但 Polanyi 本人並非主張線性發展的觀念，「鑲嵌」並不是區隔現代與前現代經濟的標誌。Beckert 強調，要充分發揮鑲嵌概念銳利的分析力，必須把鑲嵌、把社會變遷當成一個在鑲嵌、去鑲嵌、重新鑲嵌間擺盪的動態過程來掌握，而這事實上已隱涵在 Polanyi「雙向運動」的概念中：Polanyi 從經濟自主與社會自我保護兩者不斷角力的觀點說明了，當經濟循著自己獨特的邏輯發展出看似自律的市場，從原來鑲嵌的狀態變成去鑲嵌的後，將激起反向的社會自我保護運動，重新把市場、經濟鑲嵌到社會之中。理所自明，重新鑲嵌後的模式或類型勢必有別於既往。

其實，在更早的文章中，Beckert（1996: 829）就已指出，應當把市場與社會結構理解為互相拮抗的秩序機制，彼此否定，卻又互相強化，且始終保持互賴，才不會落入強調傳統與現代間相似

(conformity) 大過於改變的陷阱。唯有當我們假定行動者面對且持續不斷再生產出不確定性，才能把經濟過程視為開放及變動的。如前面指出的，新經濟社會學其實已意識到必須把「偶連性」納入分析。然而，就如此處的分析與討論顯示的，它在基本的理論觀念上不夠徹底，所以未能克竟全功，而這正是 Luhmann 以偶連性為出發點的系統理論可以與其相攻錯之處。

在這篇檢討鑲嵌概念、探討新經濟社會學憑什麼宣稱自己是社會學分析的文章中，Beckert (1996) 也認知到 Luhmann 的可能貢獻。<sup>3</sup> 在此，Beckert 強調「不確定性」才是經濟社會學的立基所在，憑此才足以與經濟學區辨，而所謂的不確定性應當理解為無法預見結果及無法分派可能結果的發生機率。<sup>4</sup> 至於經濟學家喜歡談的理性，則應理解為是個取決於行動者所面對的情境結構的變數。他指出，如

<sup>3</sup> Beckert (1996: note 60) 在此文中雖也引了 Luhmann 的《社會之經濟》(*Die Wirtschaft der Gesellschaft*)(1988)，但主要是根據《目的概念與系統理性：論目的在社會系統中的功能》(*Zweckbegriff und Systemrationalität: Über die Funktion von Zwecken in sozialen Systemen*)(1968) 這本 Luhmann 較早的著作，肯定他最佳地表述了目的如何起化約複雜性的功能。

<sup>4</sup> Beckert (2003) 後來更說，新經濟社會學必須提出自己一套有別於理性行動論 (rational actor theory) 的理論，才能與經濟學競爭，但鑲嵌的概念未能提供一套關於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與策略能動性 (strategic agency) 的理論。為此，經濟社會學需要一個微觀的基礎，理解到結構在互動中有其角色，以及「具技術的行動者」(skillful actors) 對經濟過程的穩定與動態有所影響。他主張，唯有從不確定性出發，與理性選擇及規範性理論目的論式的結構概念決裂，不再認為目的與手段互不影響，對意向性進行一個非目的論式的詮釋，才能達成此一目的。同時，他主張銜接上 Mead (1962[1934]) 與 Joas (1985; 1996) 的看法，不把行動者在情境中感知何為理性的詮釋過程看做純是主觀，而是建立在概化的期望 (即所謂概化他人的概念) 的基礎上，並相應地把鑲嵌重新理解為指涉對意義的世界進行社會性的結構化，其中，意義的創制係立基於詮釋 (the social structuration of worlds of meaning whose enactment is based on interpretation)。

果因果的複雜性使得行動者無法從偏好推論出該選擇的最佳行動選項為何的話，那麼審視施為者（agent）在無法知道如何才能得到最大化其利益的後果的情境下，賴以做出決策之認知的、結構的及文化的機制，就變得很重要。所以，不確定性不只是讓決策做成的過程變得複雜而已，而是從根本挑戰了經濟學最適化的假設，並且打開了一個社會學得以進入探究的空間：行動者如何化約不確定性，<sup>5</sup> 令高度偶連的互動情境穩定下來。撇開 Beckert 背後無法跳脫的行動論立場不論，這樣的思路極接近 Luhmann 的理論取徑。<sup>6</sup> 尤其，Beckert 在文中從社會秩序與雙重偶連性的問題切入，提及人們需要「期望結構」來化約內在於社會互動中的偶連性，根本是 Luhmann 重新詮釋過的理論版本，而非他表面上引的 Parsons（和 Edward Shils）。

### （三）Luhmann：鑲嵌／去鑲嵌同時增強的結構耦合

Beckert (2002: 206) 事實上曾公開推許，Luhmann 是迄今最徹底、最系統性地從不確定性的問題來建構社會理論的社會學家。所以，當 Beckert (2006) 強調不應遺忘 Parsons 時，我們更不能忽略

<sup>5</sup> 按 Beckert 在此文中指出化約複雜性的社會性工具主要包括四大類：一、傳統、慣習與例日常規。二、規範與制度。三、決策之先在的結構性傾向，如社會網絡、組織結構及路徑依賴等。四、權力。

<sup>6</sup> 行動論與系統論的終極立場差異，應是 Beckert 無法欣賞，乃至未能重視 Luhmann 理論的一個主要障礙。因此，Beckert 在這篇文章中主要是援引 Wenzel (1990; 2001) 而非 Luhmann 的觀點來討論 Parsons。Beckert (2002: 207; 2003) 在日後其他著作中，便突顯出此一立場差異，表明他是採取行動論的立場，主要是銜接以 George Herbert Mead (1962[1934]) 為代表的美國實用主義的傳統，尤其是經 Hans Joas (1985; 1996) 詮釋過的版本。由於理論立場出發點的差異，Beckert 對 Luhmann 常有誤解（湯志傑，即將出版），也因此錯失豐富的對話可能性。

Luhmann 對 Parsons 批判性的繼承。Luhmann 不但重新探究雙重偶連性、社會秩序如何形成等社會學根本問題，推動社會學理論繼續往前發展，還付出龐大的心力，一一重新概念化如溝通、行動、結構、時間、相互滲透、結構耦合等重要社會學概念（1984），以及市場、貨幣、價格、勞動等核心經濟概念（1988），為建構社會學的經濟理論奠定了良好基礎。

Luhmann 強調，分化，尤其是功能分化，並非一種實體切割的關係，<sup>7</sup> 將社會切割為幾個彼此互相隔離的領域，而是從特定的（系統／環境）觀點令現實加倍。所以，經濟或所謂自律市場的分化出來，並未令經濟或市場變得獨立於社會之外，而是在社會之中變得自主，<sup>8</sup> 在原來的社會現實之外，另外又製造出一個經濟的現實，而且這個新多出來的經濟現實同樣還是屬於社會，同時兼具經濟與社會兩個身份。換句話說，分化出來的經濟系統依然鑲嵌在作為整體的社會之中。從這個多元脈絡下的多重現實的觀念出發，我們不但能解決經濟行為同時也是社會行為的自我指涉弔詭，掌握到 Polanyi 或 Beckert 所說的鑲嵌、去鑲嵌、重新鑲嵌的動態，而且還能看到並成功解釋他們未能注意到的另一個弔詭：鑲嵌與去鑲嵌（或者：分化與整合）可以同時獲得強化，猶如水漲船高、同進同退的關係，而不必然是此消彼長的零合關係（詳見湯志傑，即將出版）。

---

<sup>7</sup> 功能分化之所以更能實現多元脈絡的現實建構，在於功能系統是以角色來進行涵括，而不是像分支分化及階層分化等系統分化形式主要是根據人（person）來涵括，以致仍無法完全擺脫因著人身而來的實體上的限制。這個不同系統分化形式下不同的涵括／排除形式，也是導致傳統與現代社會在鑲嵌形式上有異（或說：斷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湯志傑，即將出版）。

<sup>8</sup> 要澄清的是，Luhmann 所謂的自主，指的是自我生產（autopoiesis），而非因果上完全不受外力影響（湯志傑，1998，頁 40）。

之所以能如此，在於不同的系統分化以後，彼此間仍可有相互滲透的關係，也就是在共用相同元素的基礎上，彼此可以互相提供自己的複雜性供對方建立系統之用，從而互相影響了彼此的結構形成。尤其，不同系統間還可以進一步建立起結構耦合的機制，令其發揮類似濾波器的作用，把絕大多數的外界訊息當做雜訊排除掉，使系統可以遵循自己的節奏與邏輯，免除外界的影響和干擾（強化去鑲嵌的一面），但它同時也將特定的外界訊息從原本無法解讀的類比訊息轉換成系統本身可以處理的數位訊息，從而放大了這些特定外界訊息的影響力，產生共鳴的效應（強化鑲嵌的一面）（Luhmann, 1984: Chap. 6; 1993: Chap. 10）。<sup>9</sup> 換句話說，系統藉由窄化但同時增強彼此間的相關性，一方面既能在自主與互賴間謀得平衡，另一方面又能同時提高自己的自主性以及彼此的互賴。

所以，按系統理論從分化觀念出發的理論構想來看，我們必須同時從三個彼此互有關聯的面向深化對於鑲嵌的討論。首先，這涉及一個從鑲嵌、去鑲嵌到重新鑲嵌的動態過程，而貨幣這個溝通媒介即是促成此一動態過程、促成經濟分化出來的重要機制。貨幣把一般社會溝通從原有的脈絡中鬆脫出來，根據支付／不支付這組特定的符碼賦予其新的意義，令其鑲嵌到經濟系統之中，進而再以此身份鑲嵌到作為整體的社會之中。藉由貨幣的幫助，人們很容易便可確認彼此間從事的是經濟的溝通，而不必去管彼此背後的動機為何，甚至就是在彼此言語不通的情況下依然可以完成交易。其次，在貨幣促成經濟分化出來的基礎上，所有權、契約等結構耦合機制更進一步令去鑲嵌（＝

<sup>9</sup> 例如所有權、契約即是經濟系統與法律系統的結構耦合，而稅則是經濟系統與政治系統的結構耦合。這些結構耦合始終也都是社會關係，但不必然總是適合用 personal/impersonal 的區分，或是社會網絡來描述或分析。

自主)與鑲嵌(=互賴)同時獲得增強,使得經濟的運作得以忽略一般非經濟因素的干擾(例如不管是熟識者或陌生人都可進行交易),同時卻也更注意特定的非經濟因素,將其內部化(例如必須顧及契約的規定及不遵守的後果)。

依此,建構鑲嵌理論的重點不在探究鑲嵌的程度如何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而在建構鑲嵌(或說:結構耦合)的類型學,分析不同系統分化形式、不同社會結構形式下各有何種不同的鑲嵌(或說:結構耦合)模式,又為何如此。<sup>10</sup> 這就涉及到最後一個面向,亦即我們同時要考慮到隨著社會的演化,鑲嵌的形式相應有所改變,如此我們才能適切掌握到傳統與現代經濟行為的連續與斷裂何在。就這點來說,我們必須考慮到不同系統分化形式下,相應不同的對於人的涵括/排除(inclusion/exclusion)形式,或是邁入現代社會後,個人與角色、社會與互動間日益增加的分化,對鑲嵌形式的影響(湯志傑,即將出版)。Granovetter 經濟行為鑲嵌於人際關係之中的命題其實只看到現實的一個側面而已,不但忽略了角色(如顧客、協力廠、老闆、經理、職員、會計師、律師……)在現代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與貢獻,也未能區辨個人/角色鑲嵌(在此=涵括)的異同。

#### (四) Callon: 賦予框架/外溢到框架之外區分下的涉入/脫離

對於鑲嵌概念另一個比較深刻的反省與檢討,同樣來自歐陸的學者,亦即 STS (科學、技術與社會) 研究出身,追隨以 Bruno

<sup>10</sup> 除了鑲嵌這個核心理論議題,系統理論在其他許多議題上也可以與新經濟社會學對話,詳見湯志傑(即將出版)。

Latour 為代表的行動者—網絡理論進路的法國學者 Michel Callon。他負責主編的《市場的律則》（*The Laws of the Markets*）一書企圖從所謂 performative（展演、言說行動）的觀點，逆轉一般對鑲嵌的討論方向，反過頭來探究「經濟市場在經濟學中的鑲嵌」，亦即探討經濟學如何做、形塑及格式化經濟（Callon, 1998a），<sup>11</sup> 並主要集中於會計、市場行銷、法律等媒介經濟學與經濟的工具上。比較可惜的是，Callon 等雖然注意到了社會運作自我反身性（self-reflexivity）的問題，但還不夠徹底，未能進一步區辨自我指涉的三個不同層次，即分別與元素、過程及系統對應之基礎的自我指涉、反身性及反省；而且他們只關心逆轉先前討論的因果方向，而沒有深入探討因著自我指涉而來的循環因果性這個更為根本的問題（詳見湯志傑，即將出版）。<sup>12</sup>

Callon（1998b）為此書撰寫的導論，試圖從人類學的角度，探討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計算的施為者（calculative agent）會浮現。跟 Beckert 一樣，Callon 也主張從考慮高度不確定性的情境出發，認為如此可易於看出認知心理學及文化論者所提的解決之道限制何在。他指出，社會網絡，或更廣地來說，鑲嵌的概念可以做為在面對不確定性時，解決所謂協調（coordination）的問題的基礎。人們之所以可

---

<sup>11</sup> 另見 MacKenzie 等編（2007）關於此一視角的最新討論。雖然 Barber（1993[1977]; 1995）從科學與意識形態兩個脈絡檢討「市場的絕對化」已有類似的味道，但因未曾經過「言說行動理論」洗禮，不曾有「語言學的轉向」，沒有「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的觀念，不是從運作的角度出發，基本上仍視論述等為觀念，而非就是現實，因此與 Callon 的進路仍有重大差異。

<sup>12</sup> 如前述新經濟社會學不斷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改寫自己的歷史所顯示的，對以自我指涉的方式來運作的社會系統而言，循環的因果性是常態而非例外，任何單向、線性的因果思考皆無法適當掌握到觀察與運作間雙向的影響關係。

以不顧未來的不確定性，計算其決策，在於糾結於（entangled）關係及連結的網中。規則、習俗等並未完全支配行為，因為它們總是包含有不可化約的詮釋邊際，唯有在互動、協調及討論中才可加以移除。Callon 強調，採取此一進路的好處是，可以對施為者陷入高度不確定性的情境中時，為何還能具有計算能力的問題提供一個簡單的解釋：施為者是開放並彼此連結的，而且他們正是從這個連結中獲得了計算的能力。換言之，社會網絡分析的開放性假定把問題轉變為解答：施為者—網絡（agent-network）本質上便是建構為計算的，因為所有的行動都是根據結合、連結、關係以及採取某個位置的策略來分析的。施為者之所以是計算性的，是因為行動只能是計算性的。

由於 Callon 強調從人類學而非史學的角度出發，因此跟既有關於鑲嵌的討論同樣有未能看出傳統與現代差異的盲點。事實上，在討論市場的擴張這個議題時，Callon 還刻意強調，在充滿計算能力的施為者的社會與那些施為者並不進行計算的社會間，並沒有巨大的斷裂。然而，他舉的例子雖然原係分支分化或階層分化等前現代類型的社會，但事實上皆已在外力下被強行納入現代世界社會中了，所以這樣的論證在我看來不具說服力。<sup>13</sup>

儘管如此，Callon 的看法有其深刻之處。首先，為了避免鑲嵌／去鑲嵌這組流行詞彙可能造成的誤解，他主張改用他認為比較適當的涉入／脫離（entanglement/disentanglement）的區分來命名。其次，更重要的是，他觀察到，要理解涉入／脫離（例如：計算或交換關係）這組在同一個運動中創造出來的對立力量的分化時，並不需要用

---

<sup>13</sup> 跟 Bourdieu 的研究比較，這點就很清楚。Bourdieu（2000）研究的基本上是跟 Callon 提及的相同類型的案例，但觀察到的卻是兩種不同經濟慣習之間的拉扯、搏鬥。

互斥的、互相限制其擴張的領域或邏輯觀念來解釋，這跟系統理論功能分化係多元脈絡的現實建構的觀點極為雷同，一方面既是特定的功能，解決特定的問題，同時卻又能宣稱普遍的管轄權（Luhmann 著，湯志傑、魯貴顯譯，2001；湯志傑，1998，頁 39 以後）。

事實上，在解釋人們為何會有計算能力的問題時，Callon 注意到必須把不可計算，或是存在著未經計算的、不涉及利益的（uncalculated, disinterested）行動的問題也包括進來。在參照 Bourdieu 關於禮物經濟（相對於市場經濟）的洞見的基礎上，<sup>14</sup> Callon 引入 framing（賦予框架）的概念，主張人們計算與否，取決於 framing 這個界定的動作，也就是劃出一道包含或排除於計算之中的界限。要建構市場交易，就必須切斷事物與其他客體或是人的連繫。它必須脫離脈絡、去除連結並且被分離開來（decontextualized, dissociated and detached）。不只如此，他更指出，任何的 framing 都會製造出 overflowing（外溢到既有框架之外）的情形，也就是不可能進行全面的 framing，而任何擺脫糾結（disentanglement）的程序都會製造出新的依附（attachment）。所以，導致計算能力繁衍，同時又把它們重新銘刻到非計算性（non-calculability）的空間之中的，是同一個運動。一定程度上，這跟 Polanyi 鑲嵌、去鑲嵌、重新鑲嵌講的是同樣的觀念，只是更為清楚、深刻，尤其是注意到不可計算作為計算的基礎——這與 Luhmann（1988: 195, 239）指出現代經濟看似萬物

---

<sup>14</sup> 值得附帶一提，雖然不少人試圖結合網絡分析與 Bourdieu 同樣稱做「（建構論或發生學的）結構論」的進路或拉近兩者的距離（如 Anheier et al., 1995; de Nooy, 2003），但 Bourdieu（2005: 198）自己很清楚地與以 Granovetter 為代表的「新經濟社會學」陣營區隔開來，認為後者在避免「方法論的個體主義」時，只是落回到「互動論」的觀點，只認知到施為者有意識及經計算的期望，而忽略了整個場域的結構限制。

皆可購買，其實係建立在某些東西不可購買的基礎上的看法極為類似。

Callon 清楚地意識到，採取這種進路的好處是，可以把這種分析應用到任何東西上，並且可以避開本質論的風險。而 Callon 之所以會採取這樣的進路，背後依據的是行動者—網絡理論。在我看來，當 Callon 由此觀點出發替 Granovetter 辯護時，事實上是藉由詮釋 Granovetter 偷渡偶連性的觀念，採取一個更激進、在我看來也是更好的理論立場（亦即：用單一的行動者—網絡取代傳統上施為者及網絡兩個彼此有所區隔的觀念），徹底改寫 Granovetter 的觀點：他認定 Granovetter 主張可用來解決協調問題的網絡，並非是個將總已經在那兒的實體連結起來的網絡，而只是個描繪出存有論輪廓的網絡。在 Granovetter 那裡，所有一切都取決於它們涉入其中的關係的形態（morphology）。所以，Granovetter 談的是鑲嵌於社會關係的網絡之中，有別於 Polanyi 鑲嵌於制度的框架，即作為經濟行動在其中發生的脈絡。而且，在這樣的網絡中，所有可讓它們的描述與存有穩定下來的東西，都是隨著這些施為者彼此間關係的形式與動態而波動著的可變結果。施為者既非浸在網絡之中，亦非為網絡所框架。換句話說，網絡並非充作脈絡；施為者與網絡是一體的兩面。<sup>15</sup>

我相信，明眼人應可一眼看出，這種 Callon 稱為「可變翼式的」（swing-wing）能動性（agency，施為）的存有論，也就是能動性是隨著網絡的形態改變而改變的觀點，比較接近 Luhmann 後存有論

---

<sup>15</sup> 一個可類比，但不到改寫的例子是，Zelizer (2007: 1062) 在文章中承認，Jérôme Bourdieu 與 Johan Heilbron 為《貨幣的社會意義》（*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法譯本所寫的前言比她自己當年還清楚、還要好地詮釋了該書核心論旨對既有典範所構成的挑戰。

的觀點，而與心儀 Hempel 的 Granovetter 在基本理論立場上有相當大的差距。這就引出了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论基礎是否夠穩固的問題。<sup>16</sup> 以下，我就以結構／施為這個社會學的核心問題為例，指出新經濟社會學不足之處。

## 八、社會學的核心問題：結構與施為

其實，Granovetter 對社會學的核心理論議題是熟悉的，對於新經濟社會學理論上的局限，也有一定程度的自覺。Granovetter (1985; 1990) 在指出「行動者不受持續存在中的社會關係所影響，都是原子化的個人」的觀點，竟弔詭地同時為過度及低度社會化假定共享時，他可能便已隱約意識到，這背後涉及的是結構與施為（或說行動）的區分的根本理論問題，所以日後才會強調要致力將網絡分析與結構／施為的問題關連起來 (Granovetter, 2002)。他甚至曾特別澄清與強調，雖然網絡分析通常以個體為基本的分析單位，在方法論上比其他社會學傳統更接近個體主義的立場，但網絡的概念使得網絡分析能對經濟學新古典理論中原子化的行動概念進行根本性的批判。因此，網絡分析一方面夠接近經濟學理論，另一方面又與之有著充分的不同，正好處於結構上具戰略性的位置 (Granovetter, 1990: 95)。

不只如此，Granovetter (1990; 2002: 42ff.) 後來除了引進制度

---

<sup>16</sup> 就這個問題來說，新經濟社會學的先驅，從系統理論的角度來看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理論家 Harrison C. White (尤其是他的《認同與控制》[*Identity and Control*] 一書)，是少數的例外。他也警覺到關於社會及個人之不當存有論預設的問題，但卻是朝另一個方向尋求突破 (參見 Azarian, 2005: 113ff.)。

的社會建構的觀念，試圖走出網絡分析過於狹隘的格局外，<sup>17</sup> 慢慢也注意到時間的問題。他自己便清楚地指出，「網絡結構」這樣的講法本身是有問題的；如果我們移到較高的立足點，觀察網絡如何在時間過程中被建構的話，就可以把網絡視為較大社會過程的結果。因此，考慮社會界限或 White 所謂的耦合與去耦合（coupling and decoupling），就變得很重要。在此脈絡中，Granovetter 還特別援引了 Giddens 結構與施為是二重性而非二元性的看法，指出將網絡分析與社會學的核心理論問題連結起來的關鍵在於，用關係性的詞彙來理解像連帶、權力、規範與認同等基本概念。換句話說，對這些基本概念的界定皆有賴於社會關係，它們都是在社會網絡中產生的。儘管如此，Granovetter 同時還是堅持從行為者的動機出發，認為實際研究的主要關鍵在於結合關於個體層次複合的誘因的微觀分析，以及行動者是在怎樣的社會空間及制度中行動的宏觀分析。

這與 Polanyi 的鑲嵌進路恰恰再成對比。Polanyi 之所以選擇制度作為分析的焦點，不去談動機的問題，便是試圖超越動機決定論和本質論的窠臼（Block and Somers, 1984: 69f.; Krippner, 2001: 780; Polanyi, 1957a[1944]: Chap. 4），Granovetter（2002）卻偏好從混合動機這樣的理論立場出發。<sup>18</sup> 更關鍵的是，雖然網絡理論主張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應是關係才對，企圖發展一套關係性的分析模式，超越結

---

<sup>17</sup> 但如 Granovetter（1990: 106f.）自己承認或 Nee and Ingram（1998: 24）所強調的，要結合社會建構論的進路與 Granovetter 始終不肯放棄的因果分析有其困難。

<sup>18</sup> 因此，當 Granovetter（2005: 35）後來改用經濟與非經濟行動的「相互滲透」來取代經濟的「社會鑲嵌」，把它界定為「經濟與非經濟活動的混合，以致非經濟的活動影響到經濟活動的成本及可取得的技術」時，並沒有因為採納了相互滲透的觀點而在理論上有所突破，反而變成一種倒退。

構與施為的爭辯，Granovetter 便強調一切都應從關係來理解，但問題是，Granovetter、網絡分析或新經濟社會學真地發展出了一套非本質論式的、非實體性的關係論進路嗎？Krippner (2001: 796f.) 就批評說，儘管網絡理論有此超越的企圖，卻常陷入把結構視為既予，忽略了追問網絡最初如何形成的問題這樣的危險。縱然 Granovetter 日後把時間帶進來正面地回應了 Krippner 的批評，但迄今恐怕還是沒有真地回答 Krippner 接下來的批評：雖然網絡分析者探討的是行動者之間的關係而不是行動者本身的性質，但他們常常把網絡位置本身變成了性質，而再度落回本質論的立場。<sup>19</sup> Nee and Ingram (1998: 24) 也從另一個方向提出批評，指出 Granovetter 在分析制度的形成時，悄悄地將分析的單位從網絡結構轉移為在某一團體環境中互動的個體的行為。

有別於前述 Callon 同情式的重構，Beckert (2006: 166) 便不留情地指出，雖然 Granovetter 敏銳地觀察到過度社會化及低度社會化的行動概念的問題，但他提供作為解答的網絡分析，並沒有提供走出此一兩難的鑰匙。網絡分析採取的是結構論的進路，而非立基於行動的概念。如前面已提過的，Beckert 認為鑲嵌的概念無法提供這樣一套理論，唯有以不確定性做為經濟社會學的阿基米德點，才有望解決此一難題。

要期待 Granovetter 能跨出這一步，毋寧有些困難。因為從他迄今發表的文章來看，他的一些基本觀念恐怕無法配合調整。就像前面曾引述的，Granovetter 認為鑲嵌的論點意指，「行為與制度會受到

---

<sup>19</sup> Emirbayer and Goodwin (1994) 在檢討網絡分析的理論預設時，亦有類似的看法，Emirbayer (1997) 日後便走向並鼓吹一種徹底的關係論的立場。

持續進行中的社會關係所**限制**」(1985: 482, 黑體字為筆者強調),<sup>20</sup>若把它們建構為「獨立的」,將是嚴重且可悲的誤解。雖然他後來立場稍有放寬,不再突顯「限制」,改以較中性的「影響」(1990: 98)來描述,但始終不曾考慮到結構或社會關係也有促成的一面,一直輕忽能動性的問題——儘管他曾直接引用 Giddens 的觀點。所以,雖然 Granovetter (1985: 485; 1990: 97) 視 James Duesenberry (1960: 233) 區辨經濟學與社會學異同的名言「經濟學是門關於人們如何做選擇的學問;社會學則是門關於人們為何無法有任何選擇的學問」為過度社會化的例子,<sup>21</sup>但他自己並沒有真地走向以不確定性、偶連性與選擇為出發點的立場,而還是傾向社會結構只會對行動者構成限制,用前引 Callon 的話來說:所有的一切都取決於涉入其中的關係的形態(所謂的網絡結構)。<sup>22</sup>就是從不確定性出發,採取較激進的可變存有論立場的 Callon (1998b: 10f.) 同樣認為,網絡分析的好處在於,不論情境確定與否,對行動者來說,唯一要考慮的只有環繞著他的直接、間接關係的網絡。衝突或結盟的計算,是最基本的行動。問題是,行動者真的只需考慮這些嗎?社會世界只包括這些東西嗎?

<sup>20</sup> 類似地, Smelser and Swedberg (1994: 6) 為《經濟社會學指南》(*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所寫的導論雖也提到其他的行動者或是促成、或是限制個體在市場上的行動,但主要還是從「限制」的觀念來立論,並以此為小標題。

<sup>21</sup> 轉引自 Beckert (2002: 1)。另外就是在理論上頗具慧識與創見的 Bourdieu (2005a) 也不免落入此一陷阱,在書的內頁扉頁引了羅素文字大同小異的陳述,顯係認同這樣的說法,也難怪英語世界最初接觸 Bourdieu 時,會把他的立場歸為結構論或甚至結構決定論。

<sup>22</sup> 因此,雖然 Granovetter (1990: 99) 很早便警覺到應避免陷入時間上的化約論,把關係和關係的結構當做是不變的、沒有歷史的,但在理論上仍無法徹底跳脫過度社會化或 Mahoney and Snyder (2000) 所謂生成性的結構觀的觀點。

不過，相較來說，Callon 的理論警覺度還是比較高的。針對網絡分析常會犯化約論（亦即可以而且只需從關係網絡來「推論」施為者的策略）的批評（如 DiMaggio, 1994），Callon（1998b: 11）同意這樣的針砭並非無的放矢，更自我批判說社會資本概念的流行，將會侵蝕網絡分析的力量，因為社會資本的概念又把施為與網絡分離開來，加大了施為與結構之間的裂縫。由於 Callon 主張一種非本質性的、徹底的關係性進路，會採取這樣的立場不難理解。為了避開類似前引 Krippner（2001: 796f.）的批評，Callon 不能再從作為關係交叉點的人、個體或位置的特性出發立論，而必須反過來從關係的交會、重疊說明節點，說明施為者的性質，堅持一元的行動者—網絡的立場。<sup>23</sup>

然而，在 Callon 的鋪陳中，結構究竟指什麼是很模糊的。在我看來，Granovetter 等人或新經濟社會學陣營對結構的概念反省有限，是造成其理論發展上受限的一個重要因素。<sup>24</sup> 例如，Granovetter（1990: 99f.）認為，相較於密度較低的網絡來說，較稠密的網絡相應是個凝聚力較強的團體，能更有效地生產出影響行動者行為之規範的、象徵的及文化的結構。我認為這樣的觀點是有疑義的，<sup>25</sup> 理論上

---

<sup>23</sup> 相較來說，常被推許為網絡分析進路代表作的 Burt（1982）和 Wellman and Berkowitz 編（1988）雖然也強調關係論的立場，但恐怕未能完全避免化約論的批評，時有落入物化或本質化陷阱的危險，預設節點（個人）的先在或至少是優位性，或是雖有倒過來改從關係來界定個體或節點，卻又再度把關係物化或本質化。在我看來，網絡分析之所以難以跳脫此一缺陷，跟它缺少徹底時間化的元素概念有很大的關係。

<sup>24</sup> 相對地，在組織社會學的文獻中，因受到 Giddens「結構化」觀念的影響，對結構概念便有較多及較佳的反省（例如 Fombrun, 1986; Fuchs, 2003; Orlikowski and Yates, 2002; Ranson et al., 1980）。雖然組織社會學一直是新經濟社會學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新經濟社會學迄今似仍未能吸取此一長處。

<sup>25</sup> 針對這點，Nee and Ingram（1998: 23）也提出一個接近系統理論觀點的批評，認為依賴人際連繫來建立信賴，更常導致的應是分支分化的情形。

比較正確的說法應當是，相應於網絡是稠密或鬆散各會形成不同的結構（例如前者更有可能傾向採取規範的取向，後者則更可能傾向藉認知調適），而不是只有稠密的網絡才會形成結構。

在〈社會結構對經濟後果的影響〉（“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這篇明示要討論結構的文章中，Granovetter（2005）還是沒有正面界定或討論社會結構為何，而依然把它預設為自明。雖然 Granovetter 在此做出了些突破，特別標舉出對經濟與非經濟行動的「詮釋」，是社會結構之所以會影響經濟後果的核心原則之一，但基本上仍是延續他原有的結構「概念」，只是試圖把文化或詮釋的取徑也包括進來而已。<sup>26</sup> 從 Granovetter（1990: 98）的行文來推測，他基本上應是追隨習見的看法，把結構理解為「規律的模式」。新經濟社會學另一重要推手 Swedberg 在〈市場作為社會結構〉（“Markets as Social Structures”）一文中，對結構便有如下的界定：施為者之間藉由獎懲加以維繫的，「反覆出現的、模式化的互動」（1994: 255）。

以規律、反覆發生、模式等觀念來界定結構，相當程度上是社會學的主流共識，看似無可挑剔之處。然而，從系統理論「運作建構論」的觀點來看，結構其實是由不斷遞迴的（recursive）、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及偶連的社會運作製造出來的，所謂的規律、反覆發生及模式只是表面的印象。一如 Granovetter 在引用建構論的觀點討論制度的社會建構時所說的，結構只是看似「客觀」、「外在」（當

---

<sup>26</sup> Fourcade（2007: 1017, 1029, note 4）在批評 Granovetter「社會秩序根植於社會關係而非社會規範」的看法時也說，Granovetter（2005）在把詮釋進路包括進來的時候，依然只是重覆「規範的強度取決於網絡連繫的密度」這樣的看法。

它被物化時尤易如此），實際上不但可以有巨大及突然的改變，就是在不斷的「反覆發生」中多少仍會有所變異。追根究底，Granovetter之所以只見其一，不見其二，跟他未能接受及堅持一個「徹底的」建構論立場有關。<sup>27</sup>

把結構視為在系統遞迴的運作中凝結出來的、相對穩定的固有价值（eigen value），而不是傳統上認定的反覆發生的規律，看似只是個觀念上的簡單改變，但真要能時時貫徹，卻不是那麼容易。例如以提出「結構化」理論而知名的 Giddens（如 1979: 65f., 69, 75f.; 1984: 35）雖也有意朝此方向做突破，不但同樣強調遞迴的觀念，甚至比 Luhmann 還早談到自我生產（autopoiesis）的概念，但在行文鋪陳時，卻不免流露出把 recursive（遞迴）等同於 recurrent（反覆發生）的誤解，又落回到社會學傳統見解的窠臼之中（Tang, 2007），以致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認為結構係由行動或事件「累積」而成的習見看法（如 Granovetter, 1990: 100; Sahlins, 1981; 1991; 2005），也有類似的盲點。Archer（1982; 1995）從二元性的立場批評 Giddens 將結構與施為混同，某個意義上是看到同樣的問題。因為結構與施為雖像 Giddens 所說係相互構成，「結構既是它們遞迴地加以組織的實作的媒介，也是其結果」，但兩者畢竟有別，分屬不同的實在層次，尤其 Giddens 無法成功說服讀者為何結構同時既是人類施為「始終先在的前提」，又是其「事後的後果」。在這個問題上，Sewell（2005: Chap. 4, 7, 8）雖

---

<sup>27</sup> 不過，話說回來，Granovetter 的猶豫某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就像鑲嵌一樣，建構一詞後來也泛濫成災，外行人往往看了就厭煩、頭疼，而難以辨明何種版本才是有嚴謹的立論基礎，能提供一個圓滿的認識論解釋。我在此特別將「徹底的」加上括號，表示做形容詞用，指 Granovetter 未能貫徹建構論的立場，而非指通稱的「徹底建構論」才是唯一正解。

看到 Giddens 與 Sahlins 兩家之長，並嘗試由此建構一套事件—結構的理論，但只「局部」修正了 Giddens 明顯矛盾的結構概念——結構一方面是個「虛擬秩序」，另一方面卻又由（實際可觸及或運用的）資源與（可詮釋為虛擬的）規則組成——既未嘗試解決為何結構既是施為先在的前提，同時又是其後果此一矛盾，也未看出結構由行動或事件累積而成的講法有何不妥。

針對這些問題，Luhmann 從溝通是個一出現就又消失了的事件，以及社會系統只由溝通組成，結構則只能是期望的結構等觀念出發，能提供一個令人滿意的解答（Tang, 2007；湯志傑，即將出版）。此外，對一般所謂關係的結構概念，Luhmann（1984: 383f.）也提出一個十足「關係論式的」批判：所謂的結構並非關係本身（不論是所謂穩定的或反覆發生的關係），而是關係之間的關係，因為相對穩定不變的並非關係本身，而是作為「模式」之關係間的關係。從前述對以 Granovetter 為代表的新經濟社會學的結構概念，以及關於結構／施為問題的看法的簡短檢討應不難看出，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论根基並不够穩固，而這一定意義上正是新經濟社會學的單門，也是 Luhmann 系統理論可供其借鑑之處。

## 九、「理論」（與認同）的問題

就如前引 Swedberg（2004a: 6）的夫子自道，新經濟社會學在 1980 年代興起，致力確立自己為分支領域時，是欠缺一套理論的。這在吸引大家投入的草創初期不是問題，但長久以往，就如 Fourcade（2007: 1016f.）指出的，如果新經濟社會學只能以議題來界定自

已，滿足於佔據某個社會學領土的角落，那麼其未來只會是暗淡的。相反地，如果它能夠藉由關於經濟議題的知識來建構、精練及挑戰社會學既有的理論，那麼其前途將是光明、無可限量的。<sup>28</sup> 可惜的是，新經濟社會學迄今表現出來的比較像是滿足於「裂土為王」的偏安心態，而沒有問鼎中原、一統社會學或經濟研究天下的雄心。Fourcade 認為，新經濟社會學致力鑽研的是「經濟學的對象」(the objects of economics)，而不是廣泛的「經濟對象」(economic objects)！她進而批評說，雖然新經濟社會學可藉「鑲嵌」這個廣泛的概念把許多東西包含進來，但在跟經濟學競爭的過程中，新經濟社會學的主流其實不自覺地限縮了自己的研究範圍，而且它所採取的「結構的」進路在理論上多有限制——如前面的討論也已顯示的。

在經過 20 多年的發展後（如果以通說的 1980 年代為起點來算的話），新經濟社會學在這個問題上是否有所改善，頗值得懷疑。如 Convert and Heilbron (2007: 47, 51) 所說，新經濟社會學比較像是學科內部的結盟，而不是特定的取徑，更像是個「制度的」而非知識的計畫。它的相對統一自始便來自劃界的動作，尤其是與經濟學的新古典主義相區隔，而不是因為有清楚界定的典範或特定的知識取徑。不同背景出身，採取不同取徑的研究者接受「經濟社會學」作為共同的標籤，並不表示大家對其目的與意義有共識，情形可能剛好相反。這清楚反映在經濟社會學這個次領域的形成與鞏固上——1994 年《經濟社會學指南》的出版：儘管編者宣稱只是要描述經濟社會學的現

---

<sup>28</sup> 又 Fourcade 認為，「現代性」的問題是個適當的切入點，新經濟社會學可以並應該嘗試由此建構一套自己的理論。然而，從前面關於「鑲嵌」問題的討論來看，新經濟社會學目前致力突顯的反而是歷史的連續性，「現代性」的問題意識尚未進入到它的理論視野中。

況，並擺下第一塊基石，實際上卻透過這份「宣言」，這個「以言行事、成事的行動」(performative act)，界定並創造了經濟社會學這個分支領域 (Convent and Heilbron, 2007: 50)。<sup>29</sup>

新經濟社會學以十年之功就成功締造一個新的分支領域，殊為不易，可見其成功並非僥倖，而是建立在紮實的研究與可稱道的貢獻的基礎上。然而，如經濟學家 Piore (1996) 的長篇書評指出的，《指南》一書並未真的跟社會學的古典傳統對話，而只是個鬆散的結合，未能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論。他認為，《指南》表面上雖看似盡責地選出並討論 Marx、Weber、Durkheim、Schumpeter、Polanyi 及 Parsons 等六位代表性的理論家，但並沒有掌握到真正的問題在於，為何一度相對成功地掌握到歷史軌跡的理論不再有效、為何「歷史的」研究進路會失敗，以及能否從中挽救些什麼。他進而批評身為編者之一的 Neil J. Smelser 並未交待與結構功能論的緊密關係，以及此一偏差對全書的可能影響。Piore 在分析以 Parsons 為代表的結構功能論的長處與短處，指出其架構一方面讓經濟學與社會學得以各自據土為王，另一方面卻又容許它們進行領土競爭後，這位新經濟社會學的「外人」（但又不是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局外人」）提出了非常有趣的外部觀察，可說是代新經濟社會學擘劃了一個建構理論的藍圖。

Piore 觀察到當時在新的經濟現實上重建社會理論的企圖，直接或間接立基於下述知識傳統：一、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二、詮釋學的傳統及 Martin Heidegger、Paul Ricoeur 及 Richard Rorty 的哲

---

<sup>29</sup> Smelser and Swedberg (2005: vii) 在第二版的前言中也說，他們當年的企圖在於「鞏固」場域，因認為時機已成熟。有趣但有些自相矛盾的是，他們一方面說第二版想提供 updated 的內容，另一方面卻又堅持原書一般的知識架構仍是有用的組織框架——實際上三分之二的內容卻是新的。

學。三、現代語言學理論。四、探討語言與權力關係的理論，尤其是 Michel Foucault 及女性主義。他進而指出這四個不同傳統的共同點在於，都聚焦於人類情境中「內在的模糊性」，及因此必須透過交談與詮釋來解決溝通的模糊性的問題。基於這樣的認識，新的社會理論認為價格並非像經濟學所假定的那樣是清楚且不需詮釋的訊號，這毋寧是極罕見的情形，因此不足以作為建立一般理論的基礎。

Piore 認為，由前述觀點出發的新社會理論，至少可以在六個面向上與經濟學區別：一、經濟學是根據結果及均衡來思考，新的理論則都聚焦於過程。二、過程一直都在時間中持續進行著，因此不應用起點與終點，而應根據過去、現在及未來來表徵。三、這同時是個「學習」或「創造」，投射到未知的未來之中的過程。四、這個過程的關鍵面向之一是它生產意義或詮釋的方式，以及詮釋在時間中的演變。五、對詮釋以及因此對此一過程來說，敘述及說故事就是核心關鍵所在。六、新的理論視故事和敘述為掌握行動者及制度的認同的手段與關鍵，用以取代靜態的認同或同一性的概念，並以此取代用以表徵行動者或制度的屬性的概念（如品味或技術）。

Piore 還指出，新的社會理論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可以掌握到當時管理實務上正在進行的「革命」，亦即遠離傳統嚴格的專殊化及狹隘的分工的模式，朝整合的方向改革；這套新的理論看到「整合」不全是成本，而是個也能帶來利益的資源。企業愈來愈覺得自己的所做所為更像在「管理歷史」，而不是解決一系列的技術問題。Piore 不但敏銳地觀察到，雖然人們無法預見過程的結果，但可以藉由詮釋所發生的事物來指引或「管理」這個過程；更把這個議題與「分化」的觀念，尤其是古典社會學理論所關注的「分工的過程」關連起來，看到理論與實務不符的弔詭，體認到這或許會重新點燃人們對 Parsons

領域分化觀念的興趣。儘管 Piore「越俎代庖」地提出一套可能的理論構想，卻也不假辭色地批評新經濟社會學迄今並未嘗試如此做，因此批評說要高聲歡呼新經濟社會學的「來臨」，某意義下尚言之過早。

從同情理解的觀點出發，可以體諒新經濟社會學當時或仍有諸多為難之處，因此常顯得是折衷的局面。如前面關於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敘述提及的，Sage 基金會的資助，是新經濟社會學得以脫穎而出的重要優勢之一，而 Smelser 和 Merton (Parsons 之外結構功能論最重要的代言人) 當時正是 Sage 基金會審核贊助計劃的委員。贊助的計劃名稱「行為經濟學」，也反映出這是在舊有相對保守的知識框架內求生存 (Convert and Heilbron, 2007: 49)。所以，雖然新經濟社會學是以反叛或對抗結構功能論起家，但反諷的是，作為其里程碑的《經濟社會學指南》卻是由 Smelser 這位結構功能論的大將領銜主編。不論是從新經濟社會學藉由結盟而興起的歷史來看，還是從 Swedberg「既被包含又被排除的第三者」的特殊位置來看，<sup>30</sup> 這樣一種理論與實務上的妥協是可以理解的。<sup>31</sup>

然而，在我看來，之所以欠缺理論，不全來自學術政治的結盟所

---

<sup>30</sup> Swedberg (1990) 關於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的訪談錄，同樣也呈現出折衷的色彩。

<sup>31</sup> 比較 Smelser and Swedberg (1994) 為《經濟社會學指南》所寫的導論與 Martinelli and Smelser (1990) 這篇時間相近、但更能反映 Smelser 結構功能論觀點的不同歷史書寫的異同，不難看出妥協的痕跡。在後面這篇文章中，Smelser 強調結構功能論有別於前人之處在於，以「功能獨立的因果意象」來進行研究，但對系統特定矛盾的注意便不及其他的理論傳統。他認為結構功能論所主張的觀念是，非經濟的力量是透過規範系統的制度化來結構經濟的交換。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文章中，Smelser 採納了「結構化」(structuring) 的概念。

導致的妥協與限制而已，更重要的限制毋寧還是來自（未經深刻反省的、不自覺的）「理論」觀點本身，不然新經濟社會學不會在成功走出依附，茁壯為大樹的今天，仍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沒有統一的理論，跟沒有理論，畢竟是兩回事。以 Piore 一針見血的批評來說，新經濟社會學迄今似乎皆以漠視來回應。或許，在無力回應的情況下，漠視也是最好的策略。<sup>32</sup>

因此，儘管美國社會學會 2001 年成立了經濟社會學的 section，<sup>33</sup> 2002 年更有相關 syllabi 及教材匯編的出版，經濟社會學不但成功鞏固，更已建立起自己的傳統，可回頭檢討得失，但並沒有真正地解決其基礎不夠穩固的問題。例如，早自 1997 年起，Swedberg（1997; 2004b）便已致力於檢討新經濟社會學的得與失。在這一系列檢討與反省的文章中，Swedberg 主要的討論方式是，新經濟社會學在舊議題上有何新發展，注意到或新開展哪些新議題，又一直忽略了哪些議題。雖然他多少也觸及到欠缺一套完整理論的問題，但常只是輕輕點到帶過，不然就是出以應正視某某人的挑戰，或應注意誰跟誰的理論發展這樣的模式，而未能真正深入理論的討論。

從事後檢討的角度來看，這未免令人感到不足與可惜。因為 Swedberg 很早便認知到，新經濟社會學發展上的缺陷包括比較研究不足，以及只聚焦於美國。他指出，應藉由與他國的理論與經驗攻錯來滋養才對（1991: 270）。然而，就連 Swedberg 這位出身歐洲的學者

---

<sup>32</sup> Piore 代抱不平的 White 是個例外，White（1992）在這之前便已經將 Piore 強調的過程、故事等元素融入網絡的理論中。據此，新經濟社會學之所以沒有回應 Piore 的批評，可能原因之一是因為 White 相當程度上已先於 Piore 的批評踐履了其提示的方向。但是，從新經濟社會學對 *Identity and Control* 這本書相對冷淡的回應來看，這樣的可能性恐怕很低。

<sup>33</sup> 成立的相關背景可見 Baker（1999）的介紹。

在把目光緊盯美國的發展，乃至親自赴美打天下後，往往也不熟悉甚或輕視歐洲晚近的發展。<sup>34</sup> 像 Swedberg (2004a: 4-5; 2004b: 319) 雖特別提醒應注意 Bourdieu (2000; 2005) 的挑戰<sup>35</sup> 以及以 Boltanski and Thévenot (2006) 及 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5) 為代表的所謂習俗學派 (convention school) 的發展，<sup>36</sup> 表示認知到法國有其自成一套的經濟社會學的傳統，但相較於 Heilbron (2001) 的敘述來看，所知還是有限。<sup>37</sup> 同樣地，雖然 Swedberg、Himmelstrand and Brulin (1987: 179) 早年對 Luhmann 語多肯定，認為他提供了一個真正動態的經濟系統的概念，能在「過度社會化」與「低度社會化」的「人的概念」間取得健全的平衡；但在前引的兩篇文章中，Swedberg 卻只能行禮如儀地提一下 Habermas 及 Luhmann 這兩位享譽國際的德國理論家，而未就其理論的實質內容做任何陳述。相對地，對於有較多英文著述的 Beckert (1996; 2002)、Deutschmann (2001)、Knorr Cetina and Brügger (2002) 和 Knorr Cetina and Preda 編 (2005)，他就顯得熟悉得多，並且語多肯定。Swedberg 只知推許 Beckert 毋寧是較「傳統式」的「理論」研究，更多是在綜合與整理的基礎上求創新，卻對

<sup>34</sup> 在 Beckert (2000) 及 Heilbron (2001) 外，可參考同樣刊在 *Economic Sociology: European Electronic Newsletter* 上介紹其他國家經濟社會學發展的文章。

<sup>35</sup> 進一步可參見 *Economic Sociology: European Electronic Newsletter* 第四卷第二期「Bourdieu 與經濟社會學」的專題討論，在此，Swedberg 對 Bourdieu 有較深入的討論。

<sup>36</sup> 可參見 Jagd (2006) 讓習俗學派與新經濟社會學對話的嘗試。

<sup>37</sup> 儘管如此，跟 Granovetter (1999) 比起來，Swedberg 對歐洲的發展顯然還是有較深入的認識。在 Granovetter 的眼中，歐洲的經濟社會學界與美國沒什麼不同，只有法國才顯得稍微特別些。然而，在這樣的表面認識下，他還是認知到了差異，發現在歐洲許多經濟學家從事的研究也可歸為經濟社會學。

Luhmann 具原創性的理論工作不感興趣，<sup>38</sup> 不免令人遺憾。因為，對新經濟社會學的進一步發展來說，後者應更能提供不一樣的刺激與靈感才是。

新經濟社會學對「理論」的輕忽，是個有趣的矛盾現象。雖然社會學的研究不必然要以理論為認同的對象，但按一般研究者的慣習以及教科書的書寫習慣，理論往往是人們「再現」傳統及據以進行認同的重要參照。就是 Swedberg 與 Granovetter 等人最初在催生新經濟社會學時，也不免要回顧古典或現代的理論傳統，一方面從中汲取資源，另一方面更要與之劃界、區隔。作為「新傳統」的代表、分支領域鞏固指標的《經濟社會學指南》，一樣也在導論中按此儀式操作了一番。換句話說，新經濟社會學陣營絕對知道理論的重要性，以及它與認同形塑的關連。尤其，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新經濟社會學影響力的不斷擴散，探究起經濟行動者在複雜現實中認同的拼貼時，新世代（如 Carruthers and Uzzi, 2000: 489, 491f.）開始有了與草創宗師們方向恰恰相反的認同焦慮，認為既有作為認同核心的鑲嵌概念太過寬鬆，擔心經濟社會學影響力的擴散將導致認同的「危機」。<sup>39</sup>

相對地，我們也可以看到，非「新經濟社會學」嫡系出身、丹麥裔的 Sørensen（2003: 535ff.）卻擔心新經濟社會學以社會運動的做法取代分支領域的知識動力。他認為新經濟社會學同時以增加議題範圍及嘗試發展一套統一理論來吸引及維持成員的忠誠，是自相矛盾的做

---

<sup>38</sup> 不過，Smelser and Swedberg（2005: 17f.）的新版序至少補提了 Luhmann，並且補上《社會之經濟》以及 Beckert（2002: 201-240）對 Luhmann 的討論等相關文獻。另外 Swedberg（2003: 46）曾引述 Beckert 的說法，指出 Luhmann 被忽略，不過也就僅止於此而已。

<sup>39</sup> 值得一提的是，與新經濟社會學爭論的其中一方，是從它尚未茁生到它蔚為大樹以來，一直有著矛盾的愛恨交織關係的（新）馬克思主義者。

法，而且實際的發展只是淪為彼此不相關的多樣化。他批評說，成功的分支領域其實通常是由聚焦的現象，也就是研究對象來界定，因此新經濟社會學應當容許不同的理論進路，誇大新經濟社會學代表一種統一的進路，反而只會導致不具生產性的反效果。

這是個中肯的批評：如果我們像 Sørensen 一樣，不再把新經濟社會學當成一個社會運動的陣營，而是視為一個平常的社會學分支領域的話。當我批評新經濟社會學（不論是作為社會運動或分支領域）欠缺理論時，並不是說它應該要有，且只能有一套統一的理論，而是批評它缺乏「嚴格意義下的」理論：一套能在邏輯上自圓其說（尤其是必須能滿足應用到自己身上、將作為觀察者的自己也考慮進來這個反身性的要求），對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核心範疇有所討論與反省，並且具備歷史的視野，能說清楚現代社會究竟是個怎樣的社會，與以往的社會有何不同，同時足夠抽象，但又能啟發及指引實際經驗研究的「強理論」——這不只有別於經驗（或對象）的理論，同樣也有別於自 Parsons 的結構功能論以來常被污名化的「鉅型理論」或「大理論」。<sup>40</sup>

事實上，新經濟社會學自然是有理論的，只是多半是從實際研究中獲得的對象理論，或是配合經驗研究的中距理論，而欠缺認識論、存有論等方面的基本理論反省，沒有根據所獲得的知識成果回過頭來反省，乃至質疑知識得以形成的條件。這種認為可以把研究實務與認識論割裂開來的想法，其盲點是以形式化的方法論取代動態的理論發展（Vogd, 2007）。從這個觀點來看，法裔的 Fourcade（2007）

---

<sup>40</sup> 對此，可參見 Walther（2004）關於「大理論／強理論」的區別的討論，以及 Luhmann（1990: 13）以是否容許及包含反身性的自我指涉來超越、揚棄「經驗／超驗」區分的討論。

不但對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论做了不錯的初步整理與比較，某個意義上也踏出了必要的深化的第一步。她以市場為例，指出結構論、場域分析及所謂展演論（performativism）這三個新經濟社會學的主要陣營都同意市場是社會建構的，但分別主張建構的主要原則是行動者之間具體的社會關係（網絡分析）、社會空間或場域中位置之間的關係（Bourdieu）、正式或非正式的規則（新制度論）與技術的人造物（Callon）。他指出，結構論及場域分析關心的是潛在的社會結構如何建構市場，展演論者則主要關心市場如何建構社會這個反向的因果。她並且敏銳地指出，網絡的方法論本身構成一套對社會世界進行「幾何的再現」的理論，同時並由這樣一套特殊的社會理論所支持，因此其最純粹的版本易於落入形態決定論的陷阱。此外，雖然 Bourdieu 的場域分析跟網絡分析一樣強調關係性的思考，但並非立基於純粹的社會互動、主要聚焦於互為主體的連結，而是預設了一組不可見的力量，主要在分析行動者客觀位置間的關係。同時，在 Bourdieu 那裡，場域是事後根據其效果來界定，並無事先決定的邊界。相對地，新制度論的場域範圍就比較清楚，且很大程度上是先驗地由目的或企業社群所決定。不過，新制度論雖認為要解釋的關鍵元素是制度化而不是衝突，但跟 Bourdieu 一樣也把制度化看做權力競爭的結果，同樣強調社會結構既是外在，也是內在的。最後，展演論多半事後才決定分析的範疇，相對缺乏對「先驗」社會理論的興趣，但對「現代性」的問題卻較敏感，能夠看出在隔了一段距離之外來治理個人或實體這種現代的社會規約形式。

Fourcade 藉由檢討既有的市場理論，挖掘其理論背後的預設及基本觀念，將其往「社會理論」（theories of society）的方向開展，是值得讚許的一步。問題是，新經濟社會學的主流能否有效回應，繼續朝

此方向努力，恐怕要打上個問號。就像前面的討論已指出的，新經濟社會學已意識到並試圖回應偶連性的問題，但迄今似未見有由此發展出一套邏輯一貫的理論的企圖（撇除德裔的 Beckert 不論），而這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既有「理論」觀點的束縛。

像 Granovetter (1990: 106) 雖然嘗試結合社會建構論的說法，批評非偶連的論題儘管比較清晰、簡潔、漂亮，但無力確認「因果機制」，無法適當地連結鉅觀與微觀的層次，認為唯有透過回顧歷史，我們才能知道系統如何在幾個可能的穩定均衡中達到現在的狀態，強調社會學有能力對經濟學無法處理的、歷史中所涉及的偶連性做系統性的處理，不致淪為為個案量身特製的 (ad hoc) 解釋，提議應追求與高度偶連性一致，又不落入歷史主義的研究議程，但迄今不見他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論。<sup>41</sup> 尤其是，這跟他自己表明的，比較接近 Hempel 實證地追求一般性的、普遍的解釋的最終立場如何取得協調。同樣地，儘管 Carruthers (2006) 注意到應結合經濟社會學與歷史社會學，而且事實上，新經濟社會學，尤其是其中制度論的一支，在所謂資本主義的多樣變異這個問題上，與歷史制度論多有合流，已成功開拓出一片豐碩的研究園地，但迄今亦未見發展出一套嚴格意義下的「理論」(湯志傑，2007，頁 80 以後)。

最後，我想就兩個對「經濟社會學」做定義的嘗試來進一步討論「理論」的重要性的問題。首先是經濟學出身，立場較傾向「社會經濟學」，試圖拉近或促成經濟學與社會學多多交流的 Milan

---

<sup>41</sup> 在〈經濟制度作為社會的建構〉一文中，Granovetter (1992) 基本上只是重複已有的見解，並無新意。至於他 (Granovetter, 1990) 預告的《社會與經濟：經濟制度的社會建構》(*Society and Econom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一書，則遲遲未見蹤影。如果此一推遲是因為自知理論上仍有待解決或補強的缺陷而力求改善的話，值得樂觀期待。

Zafirovski。Zafirovski and Levine (1997) 試圖重新表述經濟社會學的主題與對象，認為以理性選擇理論為代表的經濟學探討的是「社會生活的經濟變數」，而經濟社會學探討的則是「經濟生活的社會學範疇」。某個意義下這是個有些接近系統理論「多重建構」觀點的有趣嘗試，各自從所謂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特定角度對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做一全面性的包含與掌握，並細緻地以變數與範疇來區辨經濟學與社會學理解方式的差異。只是，細讀下去，他們對「社會」的概念化恐怕是有問題的，相當程度上並未跳脫「經濟與社會」的觀察圖式，不把經濟也理解為社會的，並且仍秉持一種變項式的因果觀念，追隨韋伯所謂嚴格意義下的經濟現象／經濟上相關的現象／受經濟制約的現象的三分，強調經濟學要探究的是三者間的因果關聯。

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 Trigilia (2006) 關於經濟社會學的定義：「企圖分析經濟與社會現象間的連結 (link) 之社會學研究領域」。這個定義強調連結，毋寧反映一種「鑲嵌」的觀念，預設經濟與社會彼此分離之後，又要探究兩者之間的連結，而且極可能只限於所謂的「因果」連結。如前面關於「鑲嵌」的討論指出的，這樣的觀點對分化與自我指涉的問題都沒有充分的了解，尤其往往欠缺社會的理論 (theory of society)，無法說明在經濟始終是鑲嵌的情況下，鑲嵌的形式（而不是程度）會隨著社會有哪些不同的系統分化形式而有何變化。

相對於此，Luhmann 可以提供一套首尾一貫的「社會學的經濟理論」，不但對偶連性這個社會學的核心理論議題、對社會運作固有的自我指涉性質多有反省，並系統性地探討了二階觀察的問題，同時還深入探究各種不同的分化形式，以及相應的結構耦合或涵括／排除形式，實質回應鑲嵌的問題（湯志傑，即將出版），足以為經濟

社會學的實際研究奠定一個良好的開展基礎。更重要的是，Luhmann（1988）才真正是「入經濟學之室而操其戈」，從言之有據的社會學觀點——重新概念化價格、市場、貨幣、勞動等基本經濟概念，對此提出一套完整且具說服力的理論，就經濟的核心機制說明經濟究竟是「如何運作」的，而不是只在經濟／非經濟因素（或現象）兩者間的因果或相互影響上打轉。

對照來看，Granovetter（1990）和 Swedberg（1991）雖然認定新經濟社會學有能力直搗經濟學的大本營，對市場、貨幣、銀行等傳統上是經濟學的核心議題做出解釋，但迄今不曾見過新經濟社會學陣營從社會學的觀點重新概念化市場、貨幣、價格等基本經濟概念，進而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一套既夠全面，又能首尾一貫的「理論」。欠缺這個重新概念化，以及建立起概念彼此間的邏輯連結的基本功夫，我不認為社會學有可能提出一套足以與經濟學匹敵的「社會學經濟理論」。反過來，Piore（1996）雖然提了一個還算不錯的、足以作為建構理論出發點的建議，但由於他不認為可以（或需要）從價格建立起一般的理論，等同自行放棄直搗經濟學黃龍的機會。因此，就算真的可以由此成功建構一套理論，恐怕也只會是社會理論，而較難是社會學的經濟理論，至少是難以與經濟學理論產生競爭關係的經濟理論。

儘管 Luhmann 不是像 Fourcade（2007）期許的那樣，從經濟入手建構一套現代社會的理論，而是反過來，根據系統理論的特定視角，從作為整體的社會出發，以一貫的系統分化的理論邏輯來探討及分析政治、經濟、法律、宗教、科學……等社會的不同面向或領域，由此建構出一套完整的社會理論，但由於它做到了「強理論」的要求，因此其影響力同樣能不斷地蔓延，展現出光明的前途。這麼說並沒有任何要新經濟社會學改宗皈依系統理論的意思，而只是要藉此顯

示，如果新經濟社會學能在理論上更上一層樓的話，其前途將不可限量。事實上，新經濟社會學的先驅 White（1992）早已朝 Fourcade 期許的理想邁進，嘗試從經濟研究入手建構一套社會理論。可惜的是，新經濟社會學迄今並不珍惜 White 這個值得重視且應當重視的努力，以致徒有良好的基礎，卻未能展開全面攻堅的努力，真正建構一棟基礎穩固的理論大廈。期待新經濟社會學能在既有的基礎上早日發展出自己的一套強理論，我相信這應可從與系統理論的攻錯中獲得不少靈感與助益。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Block, Fred

2004 《後工業機會》，鄭陸霖、吳泉源校譯。台北：群學。

Luhmann, Niklas

2001 《生態溝通》，湯志傑、魯貴顯譯。台北：桂冠。

湯志傑

1998 〈社會自主性如何可能？以盧曼的系統理論拓深台灣社會自我描述的初步構想〉，《當代》，136期，頁36-53。

2007 〈勢不可免的衝突：從結構／過程的辯證看美麗島事件之發生〉，《台灣社會學》，13期，頁71-128。

即將出版 〈譯者導論：把《社會之經濟》鑲嵌到「新經濟社會學」的討論中——本書在魯曼自身著作與學界討論脈絡中的定位〉，收錄於 Niklas Luhmann 著，湯志傑、魯貴顯譯，《社會之經濟》。

### 外文部分

Abrams, Philip

1972 "The Sense of the Past and the Origins of Sociology," *Past and Present* 55: 18-32.

Anheier, Helmut K. et al.

1995 "Forms of Capital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Cultural Field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4): 859-903.

Archer, Margaret S.

1982 "Morphogenesis versus Structur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3(4): 455-483.

1995 *Realist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zarian, G. Reza

2005 *The General Sociology of Harrison C. Whit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Baker, Wayne E.

1999 “Economic Sociology Section Under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Sociology: European Electronic Newsletter* 1(1): 14-15.

Barber, Bernard

1993[1977] “The Absolutization of the Market,” in *Constructing the Social Syste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p. 217-234.

1995 “All Economies Are ‘Embedded’,” *Social Research* 62(2): 387-413.

Beckert, Jens

1996 “What is Sociological about Economic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25: 803-840.

2000 “Economic Sociology in Germany,” *Economic Sociology: European Electronic Newsletter* 1(2): 2-7.

2002 *Beyond the Market: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Efficien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Economic Sociology and Embeddednes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7(3): 769-787.

2006 “Interpenetration versus Embeddedness: The Premature

Dismissal of Talcott Parsons in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5(1): 161-188.

200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Embeddedness,” *Max-Planck-Institut für Gesellschaftsforschung Discussion Paper* 07(1).  
[http://www.mpifg.de/pu/mpifg\\_dp/dp07-1.pdf](http://www.mpifg.de/pu/mpifg_dp/dp07-1.pdf)

Block, Fred and Margaret R. Somers

1984 “Beyond the Economistic Fallacy,” in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7-84.

Boltanski, Luc and Ève Chiapello

2005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Boltanski, Luc and Laurent Thévenot

2006 *On Justific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2000 “Making the Economic Habitus,” *Ethnography* 1(1): 17-41.

2005 *The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Economy*. Cambridge: Polity.

Burt, Ronald S.

1982 *Toward A Structural Theory of Action: Network Models of Social Structure, Perception, and Ac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Callon, Michel

1998a *The Laws of the Markets*. Oxford: Blackwell.

1998b “Introduction: The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Markets in Economics,” in *The Laws of the Markets*. Oxford: Blackwell, pp. 1-57.

Carruthers, Bruce G.

2006 “Why is the Past also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Economic Sociology?” *Economic Sociology: European Electronic Newsletter* 7(2): 3-6.

Carruthers, Bruce G. and Brian Uzzi

2000 “Economic Sociology in the New Millennium,”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3): 486-494.

Convert, Bernard and Johan Heilbron

2007 “Where Di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Come from?” *Theory and Society* 36: 31-54.

de Nooy, Wouter

2003 “Fields and Networks,” *Poetics* 31(5-6): 305-327.

Deutschmann, Christoph

2001 “Capitalism as Relig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4(4): 379-386.

DiMaggio, Paul

1994 “Culture and Economy,” in Neil J. Smelser &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5-57.

Duesenberry, James

1960 “Comment o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in the Universities-National Bureau Committee for Economic Research ed.,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31-234.

Emirbayer, Mustafa

1997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2): 281-317.

Emirbayer, Mustafa and Jeff Goodwin

1994 "Network Analysis,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6): 1411-1454.

Fombrun, Charles J.

1986 "Structural Dynamics Within and Between 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1: 403-421.

Fourcade, Marion

2007 "Theories of Markets and Theories of Socie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8): 1015-1034.

Fuchs, Christian

2003 "Structuration Theory and Self-Organization," *Systemic Practice and Action Research* 16(2): 133-167.

Giddens, Anthony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1990 "The Old an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in Roger Friedland & A. F. Robertson eds., *Beyond the Marketplace*:

- Rethi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pp. 89-112.
- 1992 “Economic Institution as Social Construction,” *Acta Sociologica* 35: 3-11.
- 1999 “Mark Granovetter on Economic Sociology in Europe,” *Economic Sociology: European Eletronic Newsletter* 1(1): 10-11.
- 2002 “A Theoretical Agenda for Economic Sociology,” in Mauro F. Guillén et al. eds.,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 35-60.
- 2005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1): 33-50.
- Heilbron, Johan
- 2001 “Economic Sociology in France,” *European Societies* 3(1): 41-67.
- Jagd, Søren
- 2006 “Economics of Convention and New Economic Sociology,” *Current Sociology* 55(1): 75-91.
- Joas, Hans
- 1985 *G. H. Mead: A Contemporary Re-examination of His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The Creativity of Ac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Knorr Cetina, Karin and Urs Brügger
- 2002 “Global Macro Structur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 905-950.

Knorr Cetina, Karin and Alex Preda eds.

2005 *The Sociology of Financial Marke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rippner, Greta

2001 “The Elusive Market: Embeddedness and the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 30: 775-810.

Luhmann, Niklas

1981 “Communication about Law in Interaction Systems,” in K. Knorr-Cetina and A. V. Cicourel eds.,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p. 234-256.

1982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Soziale Systeme: Grundriß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88 *Die Wirt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90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93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Suhrkamp.

MacKenzie, Donald et al. eds.

2007 *Do Economic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honey, James and Richard Snyder

2000 “Rethinking Agency and Structure in the Study of Regime Chan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4: 3-32.

Martinelli, Alberto and Neil Smelser

1990 “Economic Sociology: Historical Threads and Analytical Issues,” *Current Sociology* 38(2/3): 1-49.

Mead, George Herbert

1962 *Mind, Self &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ee, Victor and Paul Ingram

1998 “Embeddedness and Beyond,” in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 Sage Foundation, pp. 19-45.

Orlikowski, Wanda J. and Joanne Yates

2002 “It’s About Time: Temporal Structuring i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13(6): 684-700.

Piore, Michael J.

1996 “Review of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4(2): 741-754.

Polanyi, Karl

1957a[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b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Karl Polanyi et al. ed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243-269.

Ranson, Stewart et al.

1980 “The Structuring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5(1): 1-17.

Sahlins, Marshall

1981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The Return of the Event, Again,” in A. Biersack ed., *Clio in Oceania*.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pp.37-99.

2005 “Structural Work: How Microhistories Become Macrohistories and Vice Versa,” *Anthropological Theory* 5(1): 5-30.

Sewell, William Hamilton, Jr.

2005 *Logics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melser, Neil J. and Richard Swedberg

1994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y,” in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3-26.

2005 “Introducing Economic Sociology,” in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2nd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3-26.

Sørensen, Jesper B.

2003 “Review of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by Mauro F. Guillén et 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8(3): 534-537.

Swedberg, Richard

1990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1 “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Sociology* 17: 251-276.
- 1994 “Markets as Social Structures,” in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55-282.
- 1997 “New Economic Sociology: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What Is Ahead?” *Acta Sociologica* 40(2): 161-182.
- 2003 *Principles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4a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Economic Sociology (1990s),” *Economic Sociology: European Eletronic Newsletter* 5(2): 2-17.
- 2004b “What has been Accomplished in New Economic Sociology and Where is it Heading?”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45: 317-330.
- Swedberg, Richard, Ulf Himmelstrand and Göran Brulin
- 1987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 Sociology,” *Theory & Society* 16: 169-213.
- Tang, Chih-Chieh
- 2007 “Struktur/Ereignis: Eine unterentwickelte, aber vielversprechende Unterscheidung in der Systemtheorie von Niklas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13(1+2): 86-98.
- Trigilia, Carlo
- 2006 “Economic Sociology,” in Jens Beckert and Milan Zafirovski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pp. 192-206.

Uzzi, Brian

1996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4): 674-698.

1997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1): 35-67.

Vogd, Werner

2007 “Systemtheorie als Methode? Zum komplexen Verhältnis von Theoriearbeit und empirischer Forschu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Niklas Luhmann’s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Ten Years After”, Luzern Switzerland, December 7-8.

Walther, Kampmann

2004 “Big Theory–Strong Theory,” *Cybernetics & Human Knowing* 11(3): 30-55.

Wellman, Barry and S. D. Berkowitz eds.

1988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nzel, Harald

1990 *Die Ordnung des Handelns*. Frankfurt: Suhrkamp.

2001 *Die Abenteuer der Kommunikation*. Welterwist: Verlbrück.

White, Harrison C.

1992 *Identity and Control: A Structural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Zafirovski, Milan and Barry B. Levine

1997 “Economic Sociology Reformulated,”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6(3): 265-285.

Zelizer, Viviana A.

2007 “Pasts and Future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8): 1056-1069.

Zukin, Sharon and Paul DiMaggio

1990 “Introduction,” in Sharon Zukin and Paul DiMaggio eds.,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36.

##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history of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 decipher how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consolidated as a sociological subfield by rewriting its history again and again. During delimiting its boundary again and again the multi-voices of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isappeared slowly.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became both the focus and the main theme. Consequently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was trapped in a theoretical stagnation. By way of a dialogue with systems theory I highlight the fact that the key issue i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embeddedness in different forms of differentiation rather than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embeddedness as Granovetter suggested. To make such a breakthrough we need a post-ontological shift and to re-think the central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structure/agency” from the viewpoint of radically temporalized element. Besides, it is only possible to construct a true sociological theory of economy that could be a peer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s after the sociology has reconceptualized the central economic concepts such as price, market, money, capital and labor.

*Keywords: economic sociology, systems theory, embeddedness, differentiation, structural coupling, structure/agency, post-ontology*